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411/2024
(司法上訴卷宗)

日期：2025 年 4 月 30 日

司法上訴人：(A)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保安司司長

一、概述

保安司司長(以下簡稱“被訴實體”或“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於 2024 年 5 月 8 日作出批示，駁回由(A) (以下簡稱“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訴願，並維持治安警察局局長所作的廢止其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的決定。

司法上訴人對此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並在起訴狀中點出以下結論：

“I. 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的法定判斷標準存在法律漏洞
- 應以類推適用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判斷標準以填補法律漏洞
- 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的法定判斷標準是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而判斷是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安全

或公共秩序確實構成危險

- 違反及錯誤理解第 16/2021 號法律第 23 條及第 35 條規定

1. 在 2024 年 3 月 1 日，司法上訴人收悉尊敬的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局長閣下作出廢止司法上訴人的已獲批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行政決定的通知

書，以編號為 CR5-22-0214-PCC 號刑事判決及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判定司法上訴人實施第 6/2004 號法律第 18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及給予暫緩執行徒刑，從而認定司法上訴人的犯罪行為對本地區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而依據第 8/2010 號行政法律第 15 條第 1 款及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 2 款第(二)項規定以建議廢止司法上訴人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參見附件 2 的文件 1)；

2. 在 2024 年 3 月 8 日，司法上訴人針對上述廢止司法上訴人的已獲發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行政決定向尊敬的保安司司長閣下被訴實體提出必要訴訟的申請書(參見附件 2)；

3. 在 2024 年 5 月 8 日，被訴實體作出被訴批示完全認同上述通知書，並以上述判決及合議庭裁決所確認的事實，從而主張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不同，作出“確信訴願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則(即刑法確立的規則)的人的結論性判斷及認為司法上訴人對澳門特區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結論性判斷，再以該等事實反映司法上訴人欺瞞行政當局及擾亂出入境政策和秩序而維持上述廢止僱員逗留許可的決定”(參見附件 1)；

4. 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以司法上訴人為初犯、本次犯罪後果嚴重程度屬中等，故意程度屬中等，行為不法性屬中等而給予司法上訴人一個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參見附件 2 的文件 2)；

5. 尊敬的被訴批示引用尊敬的終審法院作出第 120/2021 號合議庭裁決，從而主張行政處罰的宗旨和刑事審判的宗旨，更能被以法院“所科處的刑事處罰”用來作為對決策機關在其被賦予的法定職責和權利範圍內通過預判得出存在“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危險”這一結論的行政決定提出質疑的理由。

6. 除了對被訴實體的應有尊重外，上述合議庭裁決的案中的司法上訴人在澳門實施的刑事犯罪仍未被判有罪，故仍未法院就是否判定該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及應科處的刑罰為何，故該合議庭裁決的司法見解是不適用於本案的；

7. 按照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 629/2021 號合議庭裁決、第 373/2020 號合議庭裁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葡國最高法院作出第 627/07-5^a 號合議庭裁決的理解，《刑法典》第 48 條所規定的暫緩執行徒刑的實質前提是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即一般預防 - 及“社會的良好預測” /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 即特別預防 - 而形成司法上訴人實施非嚴重犯罪及能夠遠離犯罪；

8. 按照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給予司法上訴人的暫緩執行徒刑的實質前提是建基於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 及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而形成司法上訴人實施非嚴重犯罪及能夠遠離犯罪，意即早已符合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

9. 這樣，判定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標的是以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作唯一考量。

10. 按照澳門特區立法會在 2021 年 7 月 30 日作出第 4/VI/2021 號意見書第 68 頁至第 69 頁清楚指出，給予治安警察局一項自由裁量權，治安警察局必須考慮每一個案的具體情況，以評估是否拒絕某一名非居民入境澳門特別行政區，卻沒有判定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特別危險的法定判斷；

11. 澳門前中級法院 João Gil de Oliveira 法官閣下及現任中級法院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法官閣下就類似性的理解，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預測性判斷的依據的理由應與僅對犯罪者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的預測性判斷所建基的依據的理由應屬相同，皆因兩者的預測性判斷所建基的犯罪者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是否構成危險與犯罪者是否只要判處其徒刑作威嚇便已經達致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依據根本完全成立，故依據《民法典》第 9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類似情況；

12. 再者，非嚴重的犯罪亦僅對犯罪者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的預測性判斷的肯定而無須犯罪者實際服刑，故決定犯罪者是否仍能留在澳門特區亦應採用此標準為解決方法是合法及合

理的。

13. 這樣，依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23 條第 2 款規定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確實構成危險的預測性判斷沒有任何標準的情況下，應視為存在法律漏洞及類推以《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規定作為該判斷的標準或解決方法(依據《民法典》第 9 條第 1 款規定)；

14. 除了對被訴實體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存在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澳門特區立法會作出第 4/VI/2021 號意見書、按照中級法院的第 629/2021 號合議庭裁決及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的司法見解，被訴批示以是錯誤理解《民法典》第 9 條第 2 款、《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 2 款第(二)項的法律前提，皆因即使符合該法律第 35 條第 2 款第(二)項規定所規定的“有重大理由相信曾實施被定性為犯罪的行為或意圖實施具犯罪性質的行為的人”亦不必然廢止司法上訴人已獲得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廢止該許可的法定前提是必須考慮犯罪屬嚴重和具有特別危險方符合該等規定以廢止居留許可，而本案的司法上訴人所實施上述案件的犯罪由中級法院認定“本次犯罪後果嚴重程度屬中等，故意程度屬中等，行為不法性屬中等”及具有中級法院認同其有的“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而不對澳門特區公安秩序及公共安全構成危險，從而被訴批示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15. 除了對被訴實體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存在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按照澳門特區立法會作出第 4/VI/2021 號意見書、按照中級法院的第 629/2021 號合議庭裁決及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的司法見解，被訴批示是違反及錯誤理解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 2 款第(一)項的法律前提，皆因該法律準用第 23 條第 2 款第(一)項所規定的“曾被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外地的刑事法院判處剝奪自由的刑罰或保安處分的人”的判決是指已轉為確定的須監禁或保安處分的判決，本案的司法上訴人在上述刑事案件沒有被澳門特區法院沒有作出判處司法上訴人剝奪自由的刑罰的實際徒刑及保安處分的已轉為確定的判決，故不能適用

該規定予司法上訴人以廢止司法上訴人已獲得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從而被訴批示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II. 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中級法院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形成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 及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所形成的心證
- 違反司法決定的強制性原則
- 違反中級法院作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的實質既判案沾有無效瑕疵

16. 尊敬的被訴批示分析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所確立的司法上訴人的犯罪事實，從而作出“申請實體確信訴願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定(即刑法確立的規定)的人”的結論性判斷；

17. 從上述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的全文文本，難以認定司法上訴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定(即刑法確立的規定)的人”；

18. 被訴實體所作出的上述結論性判斷正在以被訴批示質疑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所形成的心證，皆因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認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 及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而形成司法上訴人實施非嚴重犯罪及能夠遠離犯罪，否則不能給予司法上訴人的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19. 同時，司法上訴人在澳門區只有上述刑事案件的刑事紀錄，其在澳門特區根本沒有實施其他犯罪(參見附件 8)；

20.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44 條規定，被訴實體負有遵守澳門特區法律的義務 - 亦包括遵守據第 9/1999 號法律第 8 條第 2 款及澳門《民法典》第 7 條第 4 款規定所確立被訴實體有遵守法院裁判的法定義務；

21.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 款 h 項規定，被訴實體有義務不作出任何抵觸澳門特區法院所作出的司法決定/既判案；

22. 尊敬的中級法院所作出的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已轉為確定，該裁決屬於刑事裁決及已轉為確定的情況下，該裁決屬於實質既判案及具有對判決以外的全部第三人就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及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 及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所形成的心證產生法律約束力(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49 條第 51 款、第 4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典》第 574 條第 1 款規定)；

23. 在本案的廢止逗留許可的行政程序中，被訴實體負有遵守法院裁決的義務以執行尊敬的中級法院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以確立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的前提下，亦應該遵守的中級法院認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 及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所形成的心證，否則便是違反該裁決。

24. 而且，尊敬的中級法院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給予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暫緩執行徒刑，意即亦希望司法上訴人繼續在澳門特區工作及生活以履行暫緩執行徒刑所衍生的緩刑的法定義務 - 當中包括：守法義務。

25. 除了對被訴實體的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存在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被訴實體以上述合議庭裁決而形成有別於該裁決的上述心證的司法上訴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定(即刑法確立的規定)的人”的結論性判斷等同違反該裁決，皆因該裁決的裁決部份是判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前提，並形成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 及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所形成的心證；

26. 在任何行政程序內，被訴實體完全受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84 條第 3 款準用經第 4/2019 號法律修改的第 1/1999 號法律第 8 條確立的司法決定的強制性原則所約束。

27. 回歸前的《行政程序法典》是沒有以行政行為抵觸既判案而作無效的立法，而是在現行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所增加的，從而確立行政當局必須遵守澳門特區法院所作出的全部司法裁決！

28. 除了對被訴實體的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有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按照葡國 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 教授、Pedro Costa Gonçalves 教授及 J. Pacheco de Amorim 教授針對違反既判案的理解及葡國最高法院作出第 74/11.9YFLSB.S1 號合議庭裁決就刑事實質既判案的理解，被訴批示透過分析作為實質既判案的尊敬的中級法院作出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所形成司法上訴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定(即刑法確立的規定)的人”的結論性判斷完全抵觸該實質既判案，從而被訴批示沾有違反已確定裁判而沾有無效瑕疵(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84 條第 3 款準用經第 4/2019 號法律修改的第 1/1999 號法律第 8 條、第 8 條準用《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 款 h 項規定)。

29. 除了對被實體的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有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被訴批示違反及錯誤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84 條第 3 款準用經第 4/2019 號法律修改的第 1/1999 號法律第 8 條、第 8 條分別準用《民法典》第 7 條第 4 款、依據規定《刑事訴訟法典》第 449 條第 1 款、第 4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典》第 574 條第 1 款規定，從而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III. 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違反中級法院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的實質既判案
- 違反善意原則的沾有可撤銷瑕疵
- 違反公正原則的沾有可撤銷瑕疵
- 違反平等原則的沾有可撤銷瑕疵
- 違反適度原則的沾有可撤銷瑕疵

30. 被訴批示認為：“訴願人欺瞞行政當局，其行為不但觸犯刑法，也擾亂出入境政策和秩序，對公共安全及秩序構成危險，看不出相關決定過度地侵犯了訴願人的利益以及違反善意、公正、平等及不歧視原則，本人認為被質疑的行政行為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正確，理由說明恰當”（參見附件1）；

31. 除了對被訴實體的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存在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按照葡國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教授、Pedro Costa Gonçalves教授及J. Pacheco de Amorim教授針對善意的理解，被訴批示不能僅認同司法上訴人實施上述案件的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所作出的有罪判決（參見附件3），卻不認同司法上訴人針對該判決向中級法院提出平常上訴而形成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決所判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的心證以必須推論出司法上訴人根本不可能構成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危險，從而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所規定的善意原則而沾有可撤銷瑕疵（《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規定）；

32. 更直接而言，被訴批示認同上述判決及上述合議庭裁決以認定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亦應認同該等判決及合議庭裁決確立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而不構成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危險，否則便是出爾反爾而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所確立的“善意原則” - 誠實不欺、公共當局針對司法上訴人所作出的行政活動的應有信賴，並反映出被訴批示不是以保障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而廢止行政相對人已獲批的居留許可為目的；

33. 除了對被訴實體的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存在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按照葡國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教授、Pedro Costa Gonçalves教授及J. Pacheco de Amorim教授針對公正原則的理解，被訴批示沒有公正及無私地對待司法上訴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及中級法院所建立的刑事訴訟的法律關係而認定的事實判斷和法律判斷，尊敬的初級法院及尊敬的中級法院均判定司法上訴人有罪的前提下，尊敬的中級法院改判初級法院判定司法上訴人須實際徒

刑為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事實判斷和法律判斷，從而尊敬的中級法院必然判定司法上訴人無須實際徒刑仍能阻嚇其不再實施任何犯罪的事實判斷、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 “社會的良好預測” 及 “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的法律判斷、司法上訴人具有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前提，繼而不可能構成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危險，被訴批示完全無視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決而形成一個判定司法上訴人基於法院所認定的犯罪而違反上述第 385/2023 號合議裁決的既判案的情況下，作出一個司法上訴人是 “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定(即刑法確立的規定)的人” 的結論性判斷而判定司法上訴人對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不公正的，繼而被訴批示是違反公正原則而沾有可撤銷瑕疵(《行政程序法典》第 7 條及第 124 條規定)；

34. 眾所週知，自由裁量權受行政法的一般原則所約束，在澳門特區的法律秩序沒有絕對的/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由裁量權；

35. 除了對被訴實體的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有較佳的見解的前下，按照葡國 Lino José Baptista Rodrigues Ribeiro 法官和澳門特區前中級法院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法官閣下針對適度原則的理解，被訴批示認為司法上訴人侵犯澳門特區的出入境的法律秩序，卻沒有任何依據支持必須廢止司法上訴人獲批的逗留許可的事實依據，只以認同編號 CR5-22-0214-PCC 號判決及中級法院所作出的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就司法上訴人所實施犯罪的前提，卻不認同該裁判認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和對行為人的社會有利性預測的事實判斷，從而在沒有任何客觀具體的司法上訴人如何能夠對澳門特區造成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產生危險的具體事實，從而違反適度原則而作出難以容忍地以無事實依據而廢止司法上訴人獲批的逗留許可的被訴批示，從而沾有可撤銷的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及第 124 條規定)。

IV. 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違反平等原則及其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而侵犯司法上訴人的基本權利內容

- 侵犯平等權的基本權利而沾有無效瑕疵

36. 除了對被訴實體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存在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作為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之楊允中教授就平等權的理解及葡國 Pitra António dos Santos Bondo 學者針對平等原則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的理解，被訴批示歧視司法上訴人是上述刑事案件的第二被判刑人、罪人且判定實施一項偽造文件罪，從而完全無視司法上訴人根本不能夠憑自己的一己之力對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任何具體的危險，從而司法上訴人認為其是上述刑事案的罪人而被歧視，從而作出廢止其獲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被訴批示，從而被訴批示是違反平等原則及其所衍生的不歧視原則而侵犯司法上訴人所享有的平等權的基本權利的內容的無效瑕疵(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4 條、第 33 條及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25 條及第 40 條第 1 款準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3 條、第 8 條準用《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及第 122 條第 2 款 d 項規定)。

V. 沾有理解法律錯誤的瑕疵

- 司法上訴人享有在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權的人權的基本權利的主觀權利

- 違反人道主義原則
- 侵犯在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權的人權的基本權利的沾有無效瑕疵

37. 按照尊敬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就中國人權事業、中國政府的人權觀及聯合國的人權定義的理解，人權是指作為人應有的權利 - 即作為人基於出生而必須具有的權利；該權利又稱人格權。人權包括人類的生存權/生命權 - 意即任何人均有權存活在這世界上 - 和自由全面發展權 - 是指作為人在這世界上能夠自由全面地發展其所享有的人格權的權利，並應從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及

安全感以驗證人權的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以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最終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實現人權的最高價值追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3 條第 3 款、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28 條第 4 款、第 30 條第 1 款及第 65 條第 1 款、第 40 條第 1 款準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 7 條規定)。

38. 值得強調，人權亦是保障人類尊嚴保障而應運而生的產物，更作為人類的基本權利而應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所保障，更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所確保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實現人權的最高價值追求；

39. 按照法國 Michel Deyra 教授針對人道主義原則的理解，人道的本質是預防或減輕人類所遭受的身體和精神性苦難、保護人類的身心完整性及保障人類生活與透過抱有以不傷害和拯救的態度 - 即尊重觀念的傳播，並使一個人能夠過上烈接受的、盡可能正常的生活的最低條件 - 即人道對待，並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3 條第 3 款及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第 1 款準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 7 條規定所確立的人道主義原則 (Princípio de Humanidade)得以在澳門特區有效落實；

40. 絕對肯定，人道主義原則是保障人類的尊嚴不受侵犯是不容否定的；

41. 更直接而言，人權是人道主義原則的體現及實質結果，更是確保人類的生存與自由的全面發展得到人道對待及受到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觀念得以傳播，從而達致任何人均應預防及減輕自己及他人所遭受的身體和精神的痛苦，以抱有一種不傷害和拯救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並以任何人均能夠過上一個可接受的、盡可能正常的生活的最低條件。

42. 這樣，司法上訴人享有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權的人權的基本權利的主觀權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3 條第 3 款、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28 條第 4 款、第 30 條第 1 款、第 40 條第 1 款準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 7 條規定)。

43. 而且，考慮司法上訴人實施上述刑事案至今沒有實施任何其他犯罪，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生活及工作已有 12 年(參見附件 4)；

44. 澳門特區政府應抱有以不傷害和拯救的態度而給予一個沒有實施除了上述刑事案件以外的任何犯罪的司法上訴人能夠過上可接受的、盡可能正常的生活的最低條件 - 意即繼續給予其在澳門特區居住、生活及工作 - 的人道對待，否則司法上訴人根本不能夠在菲律賓正常生活，皆因已摧毀其在澳門特區所建立的工作成果和全部努力；

45. 司法上訴人現年 34 歲；

46. 司法上訴人須供養其父親(B)及其母親(C) (參見附件 5)；

47. 在 2021 年 5 月 12 日，司法上訴人獲發編號為...的外地僱員認別證，擔任非專業僱員的高級服務員一職(參見附件 6)；

48. 自 2012 年至今，司法上訴人一直在澳門特區內的 XX 漢堡(澳門)食品有限公司工作(參見附件 4)；

49. 而且，司法上訴人在 XX 漢堡(澳門)食品有限公司擔任高級服務員一職，基本月薪為 MOP\$9,019.00 元(參見附件 7)；

50. 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有合法工作，努力學習和工作以供養父母；

51. 由於司法上訴人是初犯、在澳門特區內居住及工作的至少12年內均沒有實施上述刑事案件的其他犯罪、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努力工作及司法上訴人所實施的犯罪本屬輕微及非嚴重，故澳門特區政府應抱有以不傷害和拯救的態度而給予一個實施輕微及非嚴重犯罪及不對澳門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構成任何危險的司法上訴人能夠過上可接受的、盡可能正常的生活的最低條件 - 意即繼續給予其繼續在澳門特區逗留工作 - 的人道對待，否則司法上訴人根本不能夠回到菲律賓正常生活，皆因已摧毀其在澳門特區所建立的工作成就、全部努力和澳門特區基於努力工作而建立的工作福利，並且司法上訴人早已至少以澳門特區作為其生活中心已有12年至今；

52. 而且，澳門特區政府應抱有以不傷害和拯救的態度而給予實施輕微及

非嚴重犯罪及不對澳門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構成任何危險的司法上訴人能夠過上可接受的、盡可能正常的生活的最低條件 - 意即繼續給予其在澳門特區居住及生活 - 的人道對待，否則司法上訴人根本不能夠在菲律賓自由全面發展及生活，皆因已摧毀其在澳門特區所建立的工作成果和全部努力及司法上訴人失去在內地的全部社會福利；

53. 按照上述見解，被訴批示導致司法上訴人所獲批的逗留許可被廢止及造成司法上訴人以澳門特區作為生活中心的喪失，從而侵犯司法上訴人所享有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權的基本權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第1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4款、第30條第1款、第40條第1款準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

54. 按照尊敬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就中國人權事業、中國政府的人權觀、聯合國的人權定義的理解及法國Michel Deyra教授針對人道主義原則的理解的前提下，除了對被訴實體應有尊重外，被訴批示已剝奪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的自由全面發展權的人權的基本權利，皆因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所建立的工作的自由全面發展、學業的自由全面發展、社交的自由全面發展、以失去在本澳的工作所形成的工作的所衍生的工作福利權的前提下受澳門特區的社會福利所保護的自由全面發展完全被妨礙，更造成司法上訴人獲批的逗留許可宣告被廢止所遭受失去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精神的痛若、心理上基於失去作為澳門外地僱員身份的法定資格而喪失在澳門特區的已正常發展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及工作關係所構成的成果而沒有獲得感、司法上訴人基於失去外地僱員身份的法定資格而失去透過該資格而進行的全部發展的成果而感到不快樂、抑鬱和難受的不快樂便屬於沒有幸福感，以及基於失去以澳門特區作為生活中心而感到極其不安和恐懼而失去安全感，並在被訴實體在違反人道主義原則而侵犯司法上訴人的尊嚴、並完全阻止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特區內的自由全面發展，繼而侵犯作為人權的最高價值的追求，被訴批示沾有違反人道主義原則及侵犯在澳門特區自由全面發展的人權而沾有行政行為無效的瑕疵(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第3款及第

31條第1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28條第4款、第30條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40條第1款準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第8條準用《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d項規定)。

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批准本更正本卷宗的行政上之司法上訴的起訴狀的結論部份的聲請書及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

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在答辯狀中提出以下結論：

“A. 於 2023 年 10 月 19 日中級法院(卷宗編號: 385/2023)裁定上訴人透過與他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以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的方式，為其兒子(D)取得在澳門逗留及定居所必需的法定文件，在為(D)辦理出生登記及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手續時，透過上訴人的配合和促成，由他人向澳門有關當局聲明不真實的身份資料，使(D)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得以逗留澳門，意圖影響該類證件的公信力，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因而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並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緩刑四年；上述判決中針對上訴人之部分已於 2023 年 11 月 6 日轉為確定。

B. 被上訴實體廢止上訴人在澳門的逗留許可可是建基於上訴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欺瞞行政當局，其行為不但觸犯刑法，也擾亂出入境政策和秩序，對公共安全和秩序構成危險。

C. 終審法院認為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無疑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即上訴人“對澳門的公共秩序和安全構成危險”的判斷導致作出一項“行政決定”，而對該決定“可進行司法審查”。因此，‘所科處的刑事處罰’(換言之，所科處之刑罰的“種類”)不能被用來作為對決策機關在其被賦予的法定職責和權力範圍內通過預判得出存在‘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危險’這一結論的行政決定提出質疑的理由。

D. 眾所周知，在有關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的事宜中，上訴人是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一直是特區政府作出相關行為時考慮

的重點。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23 條第 2 款及第 35 條第 2 款 2 項的規定，如果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人士“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尤其有重大理由相信曾實施被定性為犯罪的行為或意圖實施具犯罪性質的行為的人。”則其逗留許可可被廢止；意即表示，在廢止逗留許可的問題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犯罪或預備實施犯罪是其中一個顯示獲許可逗留人士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其中一種情況。

E. 正如在整個卷宗內可以看到的，上訴人從未對其曾作出被歸責的事實提出質疑，而並沒有什麼妨礙他這樣做，以便自證其清白。這樣，對存在一份有罪判決的要求便不是為了得出已滿足“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結論而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要件，只要行政當局的判斷是基於未被反駁的事實，而且通過這些事實能夠得出相關人士的行為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的結論即可，例如該等事實屬於可歸入某項罪狀的情況，正如在本案中所發生的。

F. 刑事有罪判決的內容顯示上訴人的行為對澳門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構成潛在威脅；考慮到虛假婚姻及虛報父母的犯罪行為屢揭不止，有關的犯罪衝擊正常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倫理觀念，導致社會秩序產生混亂，從而對澳門特區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而廢止上訴人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行政決定正是為了維護澳門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因此只能得出結論認為在本上訴案中被質疑的行政行為並不存在違法瑕疵，不論是基於事實前提的錯誤，還是基於錯誤適用法律。

G. 平等原則、公正原則、適度原則、善意原則應依照相關條文擬實現的目標來判斷，換言之，應根據相關條文所擬保護或實現的財產和利益來判斷。上訴人所提出的因其逗留許可被廢止而產生的效果並不在相關條文的保障範圍之內，亦不在任何凌駕於立法者在要求逗留許可的批給必須符合澳門特區法律制度中關於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規則時所擬實現的利益之上的其他條文的保障範圍之內。這樣，行政當局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去作出廢止逗留許可的決定，這其

中牽涉到的是澳門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因此看不出相關決定以令人無法容忍的方式侵犯了上訴人的利益。

H. 被上訴實體並無意忽視上訴人繼續在澳門居住生活這個應該受到尊重的個人利益，然而首先要強調的一點是，在本案中，沒有證實上訴人在其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I. 另一方面，人道理由並不能必然導致逗留申請或逗留續期申請獲得批准，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11 條的規定，人道理由僅僅是在作出行政決定之時應予考慮的因素之一。原則上，在衡量是否廢止逗留許可時所要考慮的公共利益高於上訴人在澳門居住的個人利益。

J. 由於上訴人上訴理據不足，應駁回其請求，維持被上訴行為，即廢止上訴人於 2012 年 4 月 12 日獲批給的僱員身份之逗留許可。”

*

本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且訴訟形式恰當。

雙方當事人享有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正當性及訴之利益。

不存在可妨礙審理案件實體問題的延訴抗辯及無效情況。

二、理由說明

根據司法上訴卷宗及行政卷宗所載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審理本司法上訴案具有重要性的事實：

司法上訴人在菲律賓出生，在澳持有外地僱員身份識別證。

在初級法院第 CR5-22-0214-PCC 案中，司法上訴人被裁定與他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以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的方式，為其兒子取得在澳門逗留及定居所需的法定文件。在為其兒子辦理出生登記及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手續時，司法上訴人促成他人向澳門當局聲明不真實的身份資料，使其兒子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以逗留

澳門。在該案中，司法上訴人被裁定觸犯偽造文件罪，被判處 2 年 6 個月徒刑。

案件上訴至中級法院(第 385/2023 號卷宗)，刑罰獲准緩刑四年，且相關裁判已轉為確定。

澳門治安警察局外地僱員分處於 2024 年 1 月 9 日提出以下建議(見行政卷宗第 380 頁至 376 頁)：

“事由：廢止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補充報告書編號：400016/STNRDARP/2024P

1. 關於利害關係人(A)因觸犯“偽造文件罪”而被判刑一事，本分處繕寫了報告書(編號：DARP.878/023/TNR)建議廢止其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2. 於 2023 年 12 月 15 日，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94 條的規定，以“書面聽證”形式，將報告書擬定的意見正式通知了利害關係人(A)，而其可在收到通知書後的 15 天內，對建議內容以書面表達意見。此外，亦透過公函把可能廢止其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之情況通知其僱主。

3. 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利害關係人的代表律師向保安司司長遞交文件，內容撮要如下(詳情請參閱附件三)：

1) 利害關係人稱根據中級法院作出之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改判涉案的 3 名嫌犯(包括利害關係人)的罪名，以及給予其等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隨後，3 名嫌犯針對上述裁決提出非常上訴的統一司法見解，中級法院於 2023 年 12 月 12 日作出受理有關之上訴批示。

2) 利害關係人現年 33 歲，須供養父母。其認為不能單憑以利害關係人與本案第一嫌犯相愛而視相關男童為其兒子般對待的行為，且在有關刑事案件未有最終司法決定作出前便視利害關係人有實施犯罪，並認定利害關係人對本地區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而被視為不受歡迎的非居民。

3) 如果廢止利害關係人所獲發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造成利害關係人無

法等待上述刑事案件的統一司法見解的非常上訴成立而廢止中級法院所作出的第 385/2023 號合議庭裁決的有罪決定而存在利害關係人具有無罪的決定狀態的潛在性，從而剝奪利害關係人所享有人道原則所確立的身心完整性受尊重權的基本權利(依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28 條第 4 款及第 40 條準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第 7 條)。

4) 如廢止利害關係人所獲發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將造成利害關係人無法供養父母，侵犯作為外地居民的利害關係人享有在澳門特區工作就業的基本權利。

5) 倘利害關係人所獲發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被廢止，將使利害關係人無法等待上述刑事案件的統一司法見解的非常上訴成立而被判無罪的機會，且廢止逗留許可後，利害關係人將會被驅逐回菲律賓，並會被誤會為犯罪人而使其名譽權被侵犯。

6) 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 款 d 項規定，廢止利害關係人所獲發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行政決定侵犯利害關係人所享有的作為外地居民的利害關係人享有在澳門特區工作就業的基本權利、身心完整性權受尊重權及利害關係人所享有的人格權衍生的精神完整權及名譽權的基本權利而屬無效。

7) 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一款的規定，行政長官具權限就澳門特區的居留許可申請作出決定。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二款的規定，為作出上款所指的決定，尤應考慮以下各方面：(六) 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另外，根據第 182/2019 號行政命令第一款的規定，將第 6/1999 號行政法規第四條所指的行政長官在該等施政領域及部門和實體方面的執行權限，以及其在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的執行權限授予該司司長黃少澤。

8) 利害關係人除上述判刑外，在澳門沒有實施任何犯罪，而有關之刑事案件仍等待統一司法見解的上訴結果，故利害關係人具有無罪推定的潛在性，同時，

廢止利害關係人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將使其人格尊嚴及名譽受損，讓利害關係人回到菲律賓亦無法順利地融入菲律賓的社會生活，從而缺乏生活的必要條件，故澳門特區應抱有以不傷害和拯救的態度而給予一個仍然未能在有關刑事案內最終確定利害關係人有否實施有關犯罪的利害關係人能夠過上可接受的、盡可能正常的生活的最低條件——意即繼續給予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區工作的人道對待，否則廢止利害關係人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便造成利害關係人的人格尊嚴及名譽受損。綜上所述，應以人道理由不廢止利害關係人已獲批准的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依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第 1 款準用澳門《基本法》第 28 條第 4 款及第 40 條準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第 7 條、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六項、第 182/2019 號行政命令第一款規定）。

9) 請司長閣下裁定是次申請的全部理由成立，作出不廢止利害關係人之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行政決定。

10) 同時，利害關係人要求提供 1 名證人（請見附件一）就有關情況作出陳述。

4. 於 2023 年 12 月 28 日，利害關係人的代表律師向局長遞交了陳述書（請見附件二）：

1) 利害關係人聲稱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向保安司司長提交了一份申請書，請求司長以人道理由作出不廢止利害關係人之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行政決定。

2) 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33 條的規定：

一、如最終決定之作出取決於對某一問題之決定，而作出此決定之權限屬另一行政機關或屬法院，則有權限作出該最終決定之機關，應在該有權限之行政機關或法院作出決定前，中止行政程序；但不立即解決該事項將導致嚴重損失者除外。

二、在下列情況下，該中止即行終結：

a. 對審理前之先決問題作出決定取決於利害關係人作出請求，而該利害關係人在獲通知中止行政程序後三十日內，未向有權限之行政機關或法院提出請求；

b. 為審理該先決問題而提起之程序或訴訟程序，因利害關係人之過錯而停止進行逾三十日；

c. 基於嗣後發生之情節，如不立即解決該事項將導致嚴重損失。

三、如未有宣告中止行政程序，又或中止已終結，則行政機關須審理該等先決問題；但在該程序內所作之有關決定，將不在該程序外產生任何效力。

3) 綜上所述，由於利害關係人已向保安司司長提交了申請書，請求司長以人道理由作出不廢止利害關係人之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行政決定，而司長的決定屬於廢止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程序的先決問題，且司長才具有決定是否以人道理由而作出不廢止逗留許可的權限，故應中止本行政程序，直至司長作出的未有被提起效力之中止的保全程序的已具有執行力的行政決定(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33 條第 1 款及《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 條 b 項、第 126 條及第 127 條規定)。

4) 懇請局長裁定本陳述書的全部理由成立，作出中止本行政程序直至司長已作出未有被提起效力之中止的保全程序的已具有執行力的行政決定。

5. 根據初級法院刑事法庭於 2023 年 3 月 16 日就第 CR5-22-0214-PCC 號案卷所作之判決書內容，顯示利害關係人(A)與本案第一嫌犯和第三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以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的方式，為本案第一嫌犯及利害關係人的兒子張某取得在澳門逗留及定居所必需的法定文件，在為張某辦理出生登記及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手續時，透過利害關係人的配合和促成，由本案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向澳門有關當局聲明不實的身份資料，使張某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得以逗留澳門，意圖影響該類證件的公信力，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綜上所述，利害關係人以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了第 6/2004 號法律第 18 條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

被判處 2 年 6 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隨後，利害關係人不服上述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根據中級法院於 2023 年 10 月 19 日就刑事上訴案（編號：第 385/2023 號）所作的合議庭裁判書內容，顯示中級法院裁定利害關係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但其因對本案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的改判而在量刑方面受惠及，具體改判為：利害關係人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 6/2004 號法律第 18 條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被判處 2 年 6 個月徒刑，暫緩執行 4 年，作為緩刑義務，須在判決確定後 1 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澳門幣 30,000 元之捐獻。

6. 就有關利害關係人所遞交的文件及有關案情，本分處經分析後認為：

1) 根據中級法院就刑事上訴案所作的裁判書內容，顯示中級法院已裁定利害關係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雖然其被改判緩刑，但只是因對本案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的改判而在量刑方面受惠及，由此可見，利害關係人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份。

2) 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23 條第二款（二）項的規定，具有重大理由相信曾實施被定性為犯罪的行為或意圖實施具犯罪性質的行為的人，因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而亦被視為不受歡迎的非居民，利害關係人因觸犯“偽造文件罪”而分別被初級法院作出有罪的判決及被中級法院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故利害關係人明顯屬於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二款（二）項的規定而得被廢止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情況。

3) 當出現行政當局須依法作出廢止決定時，利害關係人所提出的侵犯身心受尊重權、工作權、人格權、精神完整權及名譽權之情況的觀點並不成立。

4) 同時，考慮到行政程序中所作的決定獨立於刑事審判，只要行政個案內具有重大理由相信利害關係人作出了涉及該案所指的事實，便應依法廢止其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5)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3 款的規定，為定出司法見解而提起

之上訴不具中止效力，以及根據中級法院於 2023 年 12 月 13 日簽發的批示內容，顯示：有關案件之上訴提起適時，上訴人具有正當性及上訴利益，現接納有關上訴，須立即且於本分卷宗上呈，有關上訴不具中止效力。(《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1 款，第 420 條配合第 391 第 1 款 b 項，第 420 條第 3 款。)

6) 考慮到虛假婚姻及虛報父母的犯罪行為屢揭不止，有關的犯罪行為嚴重衝擊正常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倫理觀念，導致社會秩序產生混亂，從而對本地區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

7) 為此，基於有重大理由相信利害關係人曾實施犯罪，為保障本澳的公共利益，建構一個安全及寧靜的社會環境，避免對澳門良好的治安形象產生負面影響，行政當局應廢止利害關係人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7. 綜上所述，基於初級法院曾對利害關係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作出有罪判決，而中級法院已裁定利害關係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以及有關的陳述理由並不充分，加上考慮到利害關係人對本地區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而被視為不受歡迎的非居民，故根據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第 15 條第一款，結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二款 (二) 項的規定，建議廢止利害關係人之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此外，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6 條的規定，基於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一款以及第二款 (一) 項及 (二) 項規定的理由而廢止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導致利害關係人三個月內不得入境澳門特別行政區，並可對其實施禁止入境的措施。

8. 另外，根據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發出第 20231228004/GSS 號公函內容，建議在局長作出批示後，把是次個案的卷宗交回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外地僱員分處，以便將處理結果向司長作匯報及把卷宗上呈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謹呈上級審批。”

治安警察局局長於 2024 年 1 月 11 日作出如下批示 (詳見行政

卷宗第 380 頁)：

“同意本報告書之意見，在此已視為完全轉錄。根據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第 15 條第一款，結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二款(二)項的規定，並行使保安司司長轉授予的權限，本人決定廢止利害關係人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

司法上訴人隨後向被訴實體提出訴願，被訴實體於 2024 年 5 月 8 日作出如下批示 (詳見行政卷宗第 428-429 頁)：

“事由：必要訴願—廢止外地僱員的逗留許可

訴願人：(A)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編號：...)

卷宗編號：P0000953020

訴願人針對治安警察局局長廢止其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的決定提起本訴願。訴願人在訴願書中主要陳述，認為被訴行政決定無視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決，從而認定其對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存有錯誤理解法律瑕疵以及違反了善意、公正、平等及不歧視原則。

同意治安警察局局長在第 103706/CPSP-STNRDARP/OFI/2024P 號公函所附隨的報告書中所作之分析，並在此予視為完全轉載。

被訴願批示所轉述的中級法院第 385/2023 號、初級法院第 CR5-22-0214-PCC 號判決書的內容，以及卷宗所載治安警察局第 400016/STNRDARP/2024P 號報告，顯示訴願人與他人共同作出有關虛報父親的行為，並因此為訴願人兒子成功取得了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得以逗留澳門，意圖影響該類證件的公信力，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因而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並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緩刑四年。

終審法院於 2021 年 9 月 24 日第 120/2021 號案合議庭裁判中認為，行政處罰的宗旨與刑事審判的宗旨是不同的，行政處罰主要是基於與維護公

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有關的預防性和安全性方面的原因。因此法院“所科處的刑事處罰”不能被用來作為對決策機關在其被賦予的法定職責和權力範圍內通過預判得出存在“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危險”這一結論的行政決定提出質疑的理由。

正如中級法院判決在 2023 年 10 月 19 日所確認的事實，使被申訴實體確信訴願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則(即刑法確立的規則)的人，繼而認為訴願人對澳門特區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因此該情況符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23 條第 2 款、第 35 條第 2 款(二)項以及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第 15 條第 1 款的規定。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規定，廢止逗留許可的權力是行政當局的一項自由裁量權。

考慮到卷宗所載資料，特別是訴願人欺瞞行政當局，其行為不但觸犯刑法，也擾亂出入境政策和秩序，對公共安全及秩序構成危險，看不出相關決定過度地侵犯了訴願人的利益以及違反善意、公正、平等及不歧視原則，本人認為被質疑的行政行為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正確，理由說明恰當；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61 條 1 款規定，決定訴願理由不成立，維持被訴願的決定。

著令將本批示內容通知訴願人。”

司法上訴人不服該決定，於 2024 年 5 月 29 日提起本司法上訴。

*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就本司法上訴發表了以下寶貴意見：

“O recorrente solicitou 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ou a

anulação do despacho proferido pelo Exmo. Sr.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e traduzido em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hierárquico necessário e confirmar a decisão (do Comandante do CPSP) de revogar a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n.º ... concedida a ele como trabalhador-não-residência.

*

1. Da arrogada lacuna

Na petição, o recorrente arrogou, em primeiro lugar, que existia a lacuna sobre os postulados do ajuizamento do conceito de "ameaça para a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e que tal lacuna devia ser integrada por via de aplicação analógica dos pressupostos materiais e factores que estão fixados no n.º 1 do art. 48.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Ora bem, é constante e praticamente assente a jurisprudência dos Venerandos TSI e TUI, segundo a qual são indeterminados os conceitos de "perigo para 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e de "ameaça para 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a título meramente exemplificativo,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9/2000, n.º 56/2010, n.º 28/2014 e n.º 206/2020), embora haja líquido e sólido consenso quanto ao significado da locução de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É verdade e óbvio que existe uma omissão, no sentido de que o legislador não define ou elenca parâmetros para orientar ou exemplificar a interpretação e densificação dos dois conceitos indeterminados supra referidos

(perigo/ameaça para a segurança ou ordem públicas).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temos por concludente que quem possua a medíocre inteligência e a comum capacidade de raciocínio não hesita em perceber e acreditar que a avaliação destes dois conceitos indeterminados é necessariamente circunstancial e casuística por natureza, por virtude de que a exactidão desta avaliação depende imprescindivelmente da acertada ponderação da conjuntura concreta de cada caso.

Nesta linha de raciocínio e em obediência à determinação no n.º 3 do art. 8.º d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estamos tranquilamente convictos de que é certamente intencional a supramencionada omissão traduzida em não definir nem elencar parâmetros para a interpretação e densificação dos apontados dois conceitos indeterminados, e que tal omissão significa que o legislador confia nos conhecimentos e experiências profissionais da Administração, e lhe atribui larga margem de livre apreciação.

Para além disso, o que é concludente e mais primordial é que esta omissão, seja como for, não implica ou gera omissão da regulamentação jurídica, na medida em que a alínea 4) do n.º 1 e o n.º 2 do art. 23.º da Lei n.º 16/2021 consagram expressamente soluções legais e os arts. 35.º e 43.º da mesma Lei estabelecem remissões para o art. 23.º.

Note-se que não é uma qualquer ausência de previsão jurídica que legitima a existência de uma lacuna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694/2007), só quando há ausência de qualquer regulamentação positiva ou costumeira do caso se diz que é omissa, lacunosa, desde que juridicamente devesse ser regulado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604/2006).

Por sua vez, afirma a douta TUI (cfr. Acórdão no Processo n.º 57/2012): Existe uma lacuna quando a lei (dentro dos limites de uma interpretação ainda possível) e o direito consuetudinário não contêm uma regulamentação exigida ou postulada pela ordem jurídica global, não contêm a resposta a uma questão jurídica.

Tudo ficou exposto até aqui conduz-nos a inferir que a apontada omissão não pode ser encaixada na categoria de lacuna prevista no art. 9.º d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e, em consequência disso, é inevitavelmente insubsistente o primeiro argumento do recorrente, não obstante que a Administração, ao interpretar aqueles dois conceitos indeterminados, tome em consideração o requisito material e os factores de ponderação consignados no n.º1 do art. 48.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

2. Quanto à invocada violação do caso julgado

Não há dúvida de que no aresto tirado no Processo n.º

385/2023 (doc. de fls.41 a 56v dos autos), o Venerando TSI decretou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por período de quatro anos da pena de prisão de dois anos e seis meses aplicada ao ora recorrente que assacou, n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a violação do caso julgado a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2.1. Note-se que dispõe art.578.º do CPC: A condenação definitiva proferida no processo penal constitui, em relação a terceiros, presunção ilidível no que se refere à existência dos factos que integram os pressupostos da punição e os elementos do tipo legal, bem como dos que respeitam às formas do crime, em quaisquer acções civis em que se discutam relações jurídicas dependentes da prática da infracção.

Em harmonia com o consenso doutrinal e jurisprudencial de Portugal, o Venerando TUI vem proclamando que o caso julgado proveniente de processos penais ou cíveis incide apenas sobre a decisão e não sobre os fundamentos (vide.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77/2012 e n.º 23/2022).

Tudo isto encoraja-nos a concluir que os fundamentos nos quais o TSI baseou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de dois anos e seis meses aplicada ao recorrente não gozam da força do caso julgado que, na verdade, cobre apenas a condenação aí especificada.

2.2. A interpretação sistemática conduz seguramente a concluir qu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aludidas no n.º 1

do art. 48.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ficam previstas no n.º1 do art.40.º deste Código. Todos os juristas conhecem que a axiologia subjacente ao n.º 1 do art. 40.º consiste na consabida dupla prevenção – a geral e a especial.

Bem, é firmemente consolidada a jurisprudência dos Venerandos TUI e TSI, segundo a qual visam tutelar 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que estabelecem o perigo ou a ameaça par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como fundamento para a revogação de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ou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E na nossa óptica, não se divisa atendível contestação e, por isso, é praticamente consensual que 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são excelentes espécies do género de «bens jurídicos», na cuja protecção reside a prevenção geral.

Daqui decorre, segundo nos parece, que há parcial coincidência entre esta revogação e as punições penais: ambas protegem a segurança e ordem públicas. Porém e apesar disso, temos ser sensata a jurisprudência do TSI, cujos sumários rezam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607/2015):

"I. A circunstância de o certificado de registo criminal não contemplar já a punição criminal imposta ao recorrente, por força de reabilitação (...), em nada constitui obstáculo ao indeferimento da pretensão relativa à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medida em que esta decisão

administrativa se move por critérios que não coincidem necessariamente com aqueles que avultam no universo penal. Isto mesmo, aliás, se deve dizer da circunstância de o certificado não fazer menção à condenação por efeito do decurso de um prazo de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sem nova condenação.

II. Tanto num caso, como no outro, o que conta para o decisor administrativo é o mundo da realidade material (aquele que se extrai dos factos ocorridos no passado temporal), não o da realidade formal (aquele que emerge de documento registral sobre o passado do indivíduo).

III. Os fins da reabilitação, na medida em que servem propósitos particulares, devem ceder perante os fins públicos servidos pela norma ao conferir o poder discricionário ao seu titular, relevando nos casos em que esteja em causa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de punir em processo criminal, pois aí só pode ser considerado pelo tribunal, no momento da decisão, o que consta do certificado (de onde foi cancelada anterior condenação por efeito da reabilitação). Mas já não valerá para efeitos administrativos no âmbito de actividade discricionária em que esteja em causa a apreciação das qualidades do indivíduo.”

Tal prudente inculca jurisprudencial demonstra, de molde seguro e inequívoco, que as punições penais e as

sanções ou medidas de polícia administrativas desempenham funções essencialmente distintas, o que não revela para efeitos penais pode ser relevante para efeitos administrativos.

Seja como for, impõe-se também destacar que no aresto proferido no seu Processo n.º 385/2023, o Venerando TSI nunca emitiu pronúncia de que ““正面的社會期盼”/ “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 Com efeito, as quais são, em bom rigor, fictícias do mandatário forense do recorrente, por isso, ele é deontologicamente censurável.

2.3. Tudo o que ficou dito acima deixa-nos a firme convicção de que é grosseiramente despropositada a versão de “除了對被訴實體的應有尊重外，在同一問題存在較佳的見解的前提下，被訴實體以上述合議庭裁決而形成有別於該裁決的上述心證的司法上訴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會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定(即刑法確立的規定)的人”的結論性判斷等同違反該裁決，皆因該裁決的裁決部份是判定司法上訴人具有暫緩執行徒刑的法定前提，並形成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 “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所形成的心證”(a 34 conclusão da petição inicial).

Daí decorre que não faz sentido algum a arguição da nulidade por ofensa do caso julgado (as 34 a 34 conclusões da petição). Devidamente vista, tal arguição patenteia concludente que o recorrente carece do conhecimento elementar no que toca ao significado e ao alcance do “caso julgado”.

*

3. Da arrogada violação dos quatro princípios e do direito fundamental

Tomando como ponto de partida, o recorrente arrogou ainda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enfermava da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a boa fé, da justiça, da igualdade e da proporcionalidade, bem como da ofensa do direito fundamental à não discriminação como componente da igualdade.

3.1. Bem, entendemos ser prudente a inculca jurisprudencial que reza (cfr.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 360/2012): "II- Um acto desproporcional é desregrado, desmedido, é desequilibrado entre o interesse público subjacente e o interesse privado nele envolvido; é um acto que apresenta uma dispositividade com uma dimensão maior do que era expectável ou aconselhável que tivesse. III- Um acto injusto é aquele que o administrado não merece, ou porque vai além do que o aconselha a natureza do caso e impõe sacrifícios infundados atendendo à matéria envolvida, ou porque não considera aspectos pessoais do destinatário que deveriam ter levado a outras ponderação e prudência administrativas. É injusto porque, podendo o seu objecto realizar-se com uma carga menor para o administrado, a este se lhe impõe, apesar disso, um gravame penoso demais."

No caso sub judice, é de frisar que as conclusões 39

a 48 da petição evidenciam que são vagas as versões aí tecidas, com efeito, o recorrente não dá, de todo em todo lado, nenhum caso prático que possa demonstrar a arrogada discriminação ou a excessiva gravidade da revog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de trabalhador não residente de que ele era titular.

Por outro lado, afigura-se-nos que é manifestamente sofismada a argumentação de que traduz em “被訴批示認同上述案件的判決書以支持司法上訴人實施犯罪，亦應認同上述案件的判決確立司法上訴人具有“正面的社會期盼”/“社會的良好預測”及“行為人將來行為的有利預測”而不構成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危險，否則便是出爾反爾而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所確立的“善意原則”—誠實不欺、公共當局針對司法上訴人所作出的行政活動的應有信賴，並反映出被訴批示不是以保障澳門特區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而廢止行政相對人已獲批的居留許可為目的” (a 42 conclusão da petição inicial).

3.2. Repare-se que o 15.º facto provado elencado no aresto tirado no supramencionado Processo n.º 385/2023 constata: “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以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締結虛假的婚姻以取得與事實不符的結婚證書，為第一嫌犯取得在澳門逗留及定居所必需的法定文件，然後向澳門當局提交上述結婚證書並申報第一嫌犯為第三嫌犯的配偶，以申請第一嫌犯來澳居留資格，意圖影響該類證明文件的公信力，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E o 16.º facto provado aludido no mesmo aresto assevera peremptoriamente: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

識的情況下，故意以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的方式，為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兒子 (D) 取得在澳門逗留及定居所必需的法定文件，在為 (D) 辦理出生登記及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手續時，透過第二嫌犯的配合和促成，由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向澳門有關當局聲明不真實的身份資料，使 (D) 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得以逗留澳門，意圖影響該類證明文件的公信力，損害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estes dois factos provados conduzem-nos a acreditar que é imaculado e inatacável o juízo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que “正如中級法院判決在 2023 年 10 月 19 日所確認的事實，使被申訴實體確信訴願人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毫無顧忌地違反最為重要而且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規則(即刑法確立的規則)的人，繼而認為訴願人對澳門特區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因此該情況符合第 16/2021 號法律第 23 條第 2 款、第 35 條第 2 款 (二) 項以及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第 15 條第 1 款的規定”。

Nestes termos e de acordo com as jurisprudências mais autorizadas e praticamente uniformes (a título meramente exemplificativo, cfr. Acórdãos do TUI nos Processos n.º 13/2012 e n.º 62/2021), temos por concludente que o despacho em causa não infringe os princípios da boa fé, da justiça, da igualdade e da proporcionalidade, nem ofende nenhum direito fundamental do recorrente.

*

4. Da violação do direito fundamental e do princípio do humanismo

Na petição, o recorrente arrogou ainda possuir direito fundamental do livre e completo desenvolvimento na RAEM e,

em consequência, ser nulo o despacho objecto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por ofender tal direito fundamental e o princípio do humanismo.

É de destacar que o recorrente tinha sido titular da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de trabalhador não residente não especializado n.º ... e foi condenado n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a disposição no n.º 2 do art. 18.º da Lei n.º 6/2004 (docs. de fls. 69 e 41 a 56 verso dos autos), e que o despacho in questio se baseia no Acórdão de condenação do Venerando TSI.

Nestes termos e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pelo entendimento em sentido diverso, colhemos modestamente que é ostensivamente abusiva e despropositada a invocação 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humanismo e do direito fundamental do livre e completo desenvolvimento na RAEM.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終審法院在案件編號為 21/2004 的合議庭裁判中表示：“...在撤銷性司法上訴中檢察院司法官不是當事人。因此，沒有法律規定妨礙法官以認同檢察院文本內容來說明裁判理由...”。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已就本司法上訴中所涉及的所有問題，發表了詳盡且精闢的意見，本院合議庭完全採納上述意見，這些意見為解

決本司法上訴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

值得重申的是，不存在司法上訴人所指的“法律漏洞”。

司法上訴人表示行政當局“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進行預測性判斷的問題上存在法律漏洞。

關於何謂“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終審法院在過往裁判中有一貫理解，這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¹。

終審法院第 84/2020 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引述 Rogério Soares 的見解：“...鑒於現代社會的複雜性，立法者大量使用不確定概念。這樣，自由裁量和不確定概念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前者是指機構在某一確定的方面享有行動自由，後者則是指以法律知識為手段去對法律進行單純解釋的約束性活動。這裡，在不確定概念中，沒有自由。一旦知道對規定的哪種解釋是正確的——在法律上每個個案都只有一種正確的解釋——法律的適用者就必須遵從這種解釋。”

終審法院第 57/2012 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引述 Baptista Machado 的見解：“漏洞總是一種不完整、一種缺陷或差錯。但是，不完整是相對於什麼而言的呢？不完整是相對於傾向完整的東西而言的。因此我們說，漏洞是一個‘違反計劃的不完整’（‘planwidrige Unvollständigkeit’）。因此，所謂的法律漏洞，便是一種與現行法的計劃相悖的不完整，而這種不完整要根據總體法律秩序所能揭示的標準來確定。當法律（在其可能的解釋限制範圍之內）和習慣法中不含有總體法律秩序所要求或期待的一種規範時——或者：對某個法律問題沒有規定出答案時，便存在漏洞”。

本院認為，立法者賦予法律適用者對第 16/2021 號法律第 23 條第 2 款內關於何謂“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進行解釋。本案資料顯示，司法上訴人與他人合謀向澳門相關部門作出虛假聲明，導

¹ 見終審法院第 84/2020 號卷宗及第 206/2020 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致法律上重要的事實不實載於其兒子的民事登記內，致使發證部門向其兒子發出不該發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司法上訴人身為非本地僱員，本應有更高的守法意識，但其違法行為足以表明其不遵守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準則和法治要求，明顯對法治社會所追求的良好秩序造成破壞。

因此，行政當局針對司法上訴人的情況，對是否構成“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構成危險”作出預測性判斷，該判斷並不存在任何法律漏洞。

另外，雖然在刑事案中，上訴人被改判緩刑，但刑事案件的審判與行政案件的審判宗旨並不相同，*“...前者主要基於對實現正義這一法益的保護和讓行為人重返社會這兩方面的理由，而後者則主要是基於與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有關的預防性和安全性方面的原因”*²。因此，即便在刑事案件中，司法上訴人被改判緩刑，行政當局在預判是否構成“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危險”這一狀況時，不受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所限制。

基於以上分析，未見被訴決定沾有違反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5 條第 2 款第 2 項及第 23 條第 2 款的瑕疵。

至於司法上訴人所主張的其他瑕疵，正如尊敬的助理檢察長所表示的，未見存在，因此本院裁定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A)針對保安司司長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准予維持被質疑的行政行為。

司法上訴人需承擔 8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² 見終審法院第 84/2020 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5 年 4 月 30 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李宏信 (第一助審法官)

盛銳敏 (第二助審法官)

米萬英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